

近代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形成及其启示

夏斯云

摘要: 上海成为国际贸易中心,经历了起步、形成、巩固3个阶段,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悠久的对外贸易传统、专门人才和贸易主体的“集聚效应”、内外贸易的一体运作带来的两个市场资源集中配置、完善健全的服务体系和适于创业的社会环境等。对外贸易推动了近代上海经济和城市的发展,使上海成为全国的商品集散地、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工业中心。今天上海重建国际贸易中心,必须要有内外贸易的共同发展;要有广阔的经济腹地,与周边城市群建立共同发展的联动机制;要有相关行业的均衡发展;要有开放的促进贸易的社会和制度环境。

关键词: 近代;上海;国际贸易中心

中图分类号: F7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894(2010)02-0026-10

近代上海自1843年开埠后,在对外贸易的牵导和推动下,迅速崛起为全国乃至远东的国际贸易中心和经济中心,成为世界闻名的国际化大都市。由于建国后的“一边倒”外交政策和计划经济等因素,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功能和影响逐渐消失,但仍然是全国的商品批发中转中心。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各地经济的迅速开放和发展,上海的商品批转中心的地位也逐渐丧失。重建国际贸易中心是上海新一轮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路径,也是上海重铸辉煌的必然选择。为此,上海市委、市政府在提出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之后,再次强调要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贸易中心,以此推进国际大都市目标的实现。目前,国家商务部与上海市正紧密合作,共同推动上海建设国际贸易中心,这个举措无疑会加快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的进程。

梳理近代上海成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原因、进程以及对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总结其经验教训,对加快今天国际贸易中心建设不无裨益。

一、近代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形成

近代上海从一个区域性的、并不起眼的城镇发展为全国乃至远东国际贸易中心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前后经历了近百年的时间。

1. 从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中期是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形成的起步阶段 鸦片战争前,由于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中国几乎全部对外贸易都集中在广州进行,^①上海的对外贸易非常有限。“上海的商业贸易,绝大部分还是国内的埠际贸易,真正的国际贸易量是微乎其微的,上海市场上的少量洋货还是转口而来的货物。”^②开埠前上海优越的区位优势没有得到

充分的认识和发挥,城市规模充其量属于中等,其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无法和广州、苏州、杭州等大城市相比。

在中国被迫开放5个口岸之后,厦门、福州、宁波的对外贸易并没有明显的增长,广州的对外贸易额不断下降,而上海的对外贸易发展却比较迅速,大宗出口商品生丝和茶叶逐渐转移到上海出口,最主要进口商品鸦片的一半进口量也转移到上海。据海关贸易统计,到1853年,上海在全国的国际贸易地位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上海对外贸易额远超广州63.8%,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口岸。^③考虑到当时中国进出口贸易主要通过上海和广州进行,其时上海对外贸易额要占到全国对外贸易额的60%以上,这种水平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正如马克思所说:“让出5个新口岸来开放,并没有造成5个新的商业中心,而是使贸易逐步由广州转移到上海。”^④

这个阶段的最大特征是上海的对外贸易量迅速超过广州,许多外国商行先后由广州移设上海,我国国际贸易的重心逐渐由广州转移到上海,为上海成为国际贸易中心奠定了重要基础。

2.19世纪6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是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正式形成阶段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陆续增辟长江和华北各口岸,到甲午战争前达34处,天津和汉口成为除上海外两个较大的新对外贸易口岸,但上海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中心地位没有削弱。到1894年,上海对外贸易仍然要占到全国进出口总值的一半以上,特别在进口方面,要占到全国进口总值的60%以上。^⑤随着更多的区域被迫开放和近代工业在上海的兴起,上海进出口商品日益多元化,这种多元化既反映中国进一步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也反映了上海和内地的市场联系日益密切,上海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在上海进出口贸易中,有50%以上都是转运到其他口岸去的,上海成为全国对外贸易转运中心。据海关贸易报告,1870年代上海口岸进口商品种类约180种,到1894年增至580多种。单一进口生活资料的结构被打破,机械等生产资料的进口开始增加,到1893年占8.4%,在出口商品中,丝、茶等大宗传统出口商品由于印度、日本等国的竞争日益衰落,一些新的原料性农副产品开始进入国际市场,1870年代中国出口商品种类80多种,到1894年增至200多种。^⑥

这个阶段的最大特征是进出口贸易量稳定在全国的一半左右,内外贸易融为一体,贸易主体迅速集聚,人才优势显著,服务体系和功能不断完善,制度不断创新,国际贸易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牵导作用十分强劲,对周边地区具有十分强大的集聚和辐射力量。上海已稳步地成为全国的国际贸易中心。

3.19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世纪30年代是上海国际贸易中心不断巩固阶段,并向全国乃至远东经济中心发展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1913年已增长到98960万关两,较1894年的29375万关两增加了2.7倍。由于战争原因,在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期间,贸易额基本停留在战前1913年的水平。战后贸易增长的速度加快,到1931年,全国对外贸易总值已增长到235766万关两,与1918年的106353万关两相比,增长了1.2倍。由于其他地区对外贸易的发展,上海在全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虽有所下降,但贸易额一般还占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40%左右。从1933年起,因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等原因,上海对外贸易总额经常占全国50%以上,以后这种状况持续保持,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不仅没有动摇而且不断巩固。正如时人所谓:“盖上海一埠,就中国对外贸易言之,其地位之重要无异心房,其他各埠则与血管相等。”^⑦

这一阶段最大的特征是上海不仅巩固了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更进一步发展成为全国的

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和工业中心,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多功能经济中心,多种功能互相促进,上海成为闻名世界的国际化大都市。

二、近代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形成的原因

上海之所以能成为全国乃至远东国际贸易中心,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有自然资源禀赋的条件,也有制度创新的因素;既有硬的物质条件,更有软的社会环境。

1.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首先是上海十分优越的地理条件。上海襟江带海,地处中国漫长海岸线中心、长江入海口,连通太湖和运河,拥有四季均可通航的优良港口,水路交通运输便捷,开埠前已开有北洋、南洋、长江、运河等4条重要航线。由于对外贸易的推动,19世纪50年代,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沿海航运网络,中西交通的远洋航线从上海延伸拓展。^⑧正如时人所谓:“上海是中国沿海对外贸易上最为重要的商港,因此吸引着国际方面很大的注意。我所熟悉的城市中,没有其他城市具有上海那样的优点。”^⑨其次是上海有着广阔的经济腹地。上海所处的长江三角洲是近代中国经济最繁荣富庶的地区,它地域深广,拥有众多的城镇和人口,物产丰富。近代中国国际贸易的大宗商品丝、茶等,大多盛产于长江三角洲及周边地区,过去经广州出口,十分不便。上海开埠后,“杭、湖各府”等原先出口海外的丝、茶商品即刻就近向上海“运往售卖”。^⑩深广的长江三角洲经济腹地,为上海成为国际贸易中心奠定了重要的经济基础。鸦片战争期间,就有人估计到:“上海和它相连接的物产富饶的省内各主要的城市,依靠精密的内河航运系统,互相交流联系……上海必然成为大宗进出口贸易的集散地。”^⑪

2.悠久的对外贸易传统 上海对外贸易兴起于12世纪的北宋末年。在南宋时代,上海同国内外的商业联系逐渐开展,前来贸易的国内外商人络绎不绝,管理内外贸易的机构先后建立,并顺应商业发展和人口的聚多而设立了镇。元、明时代进一步发展,甚至出现了一批为对外贸易服务的专业舶商梢水人员。明末清初,由于封建王朝的海禁政策,上海的对外贸易一度衰落。康熙、雍正年间,清政府复开海禁,上海的对外贸易得以恢复,渐趋活跃,并设立海关管理海外贸易。“往来海舶俱入黄浦编号,海外百货俱集”。乾隆年间清政府实行广州一口通商制度,上海对外贸易又趋停滞,但仍然“人口稠密,商贾辐辏”,^⑫开埠前夕已有商帮机构达30家之多。^⑬悠久的对外贸易传统为开埠后的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形成打下了较好条件。

3.专门人才和贸易主体的“集聚效应” 首先是国际贸易人才的集聚。上海开埠后,原在广州从事对华贸易的洋行大班挟巨资踏上黄浦滩头。据记载,1854年,上海已有243个外国人,其中至少有200人左右从事商业活动。到19世纪60年代中期,“住在租界范围内有2750个外国人”,其中至少有2500人参与中西贸易活动,许多是实力雄厚的“商业大王”。^⑭原先为对外贸易服务的“通事”、“买办”也尾随而至,在新开埠的上海寻找发财机会。这些人资金雄厚,经验丰富,熟知中外贸易通行规则,了解中国情况,商业信息敏感,善于与各类商人打交道,更具有企业家的冒险创业精神,起到了东西间的桥梁作用。^⑮上海成为国际贸易中心的众多商机也吸引了全国各地商人到上海来发展。特别是江南地区的许多富商殷户,为躲避太平天国运动,携带巨额资金纷纷聚集上海租界。这些传统的商人富户逐渐在上海定居,在洋商买办的影响之下,不少人逐渐衍变为新一代从事内外贸易的商人群体。各类国际贸易人才的汇聚,为上海形成国际贸易中心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其次是作为贸易主体的总部聚集。随着对外贸易重心逐渐由广州向上海转移,上海充满了无限商机,“转手间,巨富可致”。^⑥巨大的商业利益吸引了外国洋行纷纷移设上海,并随着上海进出口贸易的增长而增长,以致在外滩形成了“洋行街”。上海开埠的当年,就有广州的5家洋行移设上海。第二年,在上海营业的洋行就有11家之多。1847年,“上海租界内已经开设起24家进出口洋行(包括3家美国洋行),5家洋商店铺,1家旅馆和俱乐部了”。随着上海对外贸易的日益扩大,洋行迅速增多,到1850年,不仅增加了许多为适应进出口贸易而设立的仓库、拍卖行、海船用品商店、伙食店,而且还创办了英文报纸《北华捷报》、药房、银行等,并专门成立了英商商会。以后,洋行的开设数不断上升,1936年达到675家,其中,欧美洋行561家,日商洋行114家。^⑦这些洋行依恃不平等条约,操纵和垄断中国的对外贸易,在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但这些洋行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掌握世界贸易行情信息和完善的销售网络,具有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经营着银行、航运、保险、仓储等国际贸易的相关配套企业,确实对推进上海对外贸易的发展起到了历史不自觉工具的作用。伴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上海也兴起了一批专门为洋行买卖服务的本地商人和商号。他们从承担洋行与内地商贩的中转批发,到自行贩运,并朝专业发展,开设起自营的丝行和茶行,逐渐形成参与国际贸易的企业主体。20世纪初,华商在南洋贸易和东洋贸易的基础上开始涉足西洋贸易。据统计,1945年,上海有从事进出口国际贸易的企业2100多家。^⑧贸易主体的集聚效应,使上海成为国际贸易的头脑和决策中心,成为资金流、信息流、物资流等的交汇地,这无疑对近代上海成为全国乃至远东的国际贸易中心发挥了重大作用。

4. 内外贸易的一体运作, 两个市场资源集中配置 近代上海既是全国的对外贸易中心,也是近代中国的埠际贸易中心。内外贸易一体化的强大功能不仅贯通了中西贸易,也强化了上海与其他口岸之间的经济联系,形成了以上海为交汇点的联系世界市场的贸易扇面和融通内地埠际贸易的经济扇面,使得进口商品由上海输送到内地城市和农村,出口商品诸如杭嘉湖地区的丝、闽浙皖的茶、四川的猪鬃和桐油等以及内地的各种产品和土产先转运上海,然后出口世界各国。这种内外贸易两个扇面和内外贸易一体化的运作模式,使上海不仅承担链接中西贸易的交汇平台的作用,还发挥了我国南北货物的集散转运中心的功能。上海的国际贸易一直占据我国外贸的50%左右;上海的埠际贸易占我国外贸各通商口岸总值的一半以上,有时几近九成。这种内外贸易的一体化,充分发挥了把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资源相互融和、集中配置的功能,凸显了上海商品集散和贸易中心的地位。

5. 完善健全的服务体系, 适于创业的社会环境 国际贸易中心的形成突出的是商品、信息、服务等集聚,所以需要一个围绕内外贸易的配套服务体系。在内外贸易的牵导下,上海逐渐形成了健全完善的国际贸易的服务体系。金融、保险、航运交通等业与国际贸易如影随形般地发展起来,大大便利了对外贸易的进行,降低了交易成本。另外,近代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地位的形成离不开优良的社会环境的支撑。近代上海由于商业传统、中西交汇、移民汇聚等因素,逐渐形成了一种适宜于创业的特有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主要表现在:一是开放包容的观念心态。上海人多半移民,观念开放,愿意接纳新事物,没有广州和北方那样的激烈排外情绪。二是代表现代市场经济的制度创新。有学者研究,上海在国际贸易中心形成过程中伴随着一系列的制度创新,比如租界制度、买办制度、新式工厂制度、产权制度等,“上海相对较少传统势力的束缚形成了有利于制度创新的环境,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不断建立及租界内实施的西方产权制度又使私有权得到相应保障。”^⑨三是自

由宽松的社会环境。鸦片战争后,广州传统外贸口岸受传统观念和制度影响,对于外商取得的特权心怀抵触,其“自由居住或经商之权,尤未肯轻允”。^⑨而上海是新开商埠,无旧规约章限制,“洋商贸易,可以纯任己意,力谋发展,较诸从前在粤经商须受‘公行’之支配者,不可同日而语。”^⑩租界制度建立后,列强逐步取得行政、司法、警察等权,洋商可以自由置产居住。上海租界的特殊地位,使得上海相对旧中国其他地域的连年战乱而言,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开放有序的经营环境。

近代上海成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原因还可以列举出许多,以上仅仅从几个大的方面分析。由此可见,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一个系统不断磨合和筛选的结果。

三、对外贸易推动了近代上海经济和城市的发展

对外贸易在近代上海城市发展过程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正是对外贸易的牵导,上海由商兴市;也正是国际贸易中心在上海的形成,直接推动了相关产业和城市经济的发展,上海才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

1. 对外贸易直接推动了上海埠际贸易和新式商业的形成,上海成为全国商品的集散地

大量的进出口商品在上海汇集,必然带动上海对内埠际贸易和相关商业的迅猛发展。上海除了经营本地的进出口商品,还承担了全国各地商品的转口任务。到1894年,上海的埠际贸易占了全国一半以上,其中进口商品约占67%,出口商品约占50%。“浙江的丝,……总是采取方便的水路运往上海这个丝的天然市场。”^⑪在对外贸易的作用下,一批专卖洋货的清洋布店、五金店、洋广杂货店、西药店、颜料行等开始在上海出现,并且发展迅速。以洋布店为例,1850年,第一家专营洋布的同春洋货号开业,到1858年,同样的洋布店增加到十五六家,并成立了同业会所“振华堂洋布公所”;1884年增加到62家;1900年更增加到130多家。^⑫同样,上海旧有的商业行业随着对外贸易的影响而发生相应的变化,经营资本显著增长,采用新式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与外国商号逐步接轨,逐渐形成了与对外贸易日益发展相匹配的新式商业。与对外贸易和新式商业的发展相适应,新式的商业流通体系发展起来,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以上海的外贸商行为主体,延伸连接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腹地的商业流通网络。进入20世纪以后,上海与全国各地交易的城市不断扩大,商品的种类早已不止丝、茶等几项出口的大宗商品,包括了上海工业生产和居民日用消费所需的各种原料和农副产品,以及从上海进口的国外产品和上海制造的国货机制产品。1936年,上海的埠际贸易总值已达8.91亿元,几乎同埠际贸易占全国第2至7位的汉口、天津、广州、胶州、汕头、重庆6个城市的总和相等。^⑬

上海成了全国商品的大市场,上海的市场供求信息成了全国商品的晴雨表,对全国各地市场和商品起到了重要影响和调节作用。

2. 国际贸易直接带动了上海金融业的发展,上海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

金融与贸易如影随形。伴随着上海对外贸易中心地位的形成和确立,上海的金融业迅速发展,逐渐成为近代中国的金融中心。

为了配合对华贸易的进行,早期在华洋行既进行贸易,又经营汇兑、保险、航运等业务。随着上海对外贸易的勃兴,上海的近代金融业应运而生。从1847年英国丽如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开始,为外贸服务的外资银行先后设立,到1927年,外资银行(含中外合

资银行)达到35家。外资银行通过在各口岸设立分支机构,建立起自己的金融网络,通过汇兑业务、存贷款业务、资金拆借业务、发行纸币等金融活动,为对外贸易提供支持。正是由于银行资本的支持,大量中小外贸企业得以参与对外贸易,从而扩大了上海的对外贸易。

中国传统的金融机构钱庄和票号也日益卷入对外贸易。1913~1926年,上海新设钱庄101家。^⑤票号的营业重心逐渐转移到上海,“这些票号多数在上海设有分支机构”。^⑥它们为参与对外贸易的华商提供信用支持和资金融通,^⑦并得到外商的认可和支持,对上海对外贸易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推进作用。

外国银行的大批进入上海,刺激了华资银行的兴办。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设立于上海。到1925年,已有华资银行158家。由于华资银行和钱庄的发展,虽然外资银行仍然占据着上海金融市场的主宰地位,但3者的比重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据估计,到1925年,外国银行、钱庄、华资银行所占比重为36.7%、22.5%、40.8%,华资银行在上海金融市场中的地位逐渐增强。^⑧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各原总部在北方的大银行如中国、交通、金城、盐业等银行也将总部陆续南迁上海,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也设在上海,全国著名银行的总行有81%设在上海,上海银行业的存款占全国的比重在1936年达到47.8%。^⑨

得力于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上海成为全国最大、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不仅为对外贸易,而且为整个中国的经济提供支持。正如时人所说:“吾国金融重心,因沪市工商业发达,而又为国际贸易之中心,故向以上海为枢纽,尤如英国伦敦、美国纽约、法国巴黎。”^⑩

3. 对外贸易直接拉动了上海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上海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的航运中心

对外贸易与航运业的发展相辅相成,上海襟江带海,具有发展现代航运业的天然优势。航运中心的形成当然离不开天然良港这种自然资源禀赋,但是仅此还不够,航运中心需要强大的物流为内容。随着上海成为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内外贸易的日渐繁荣,推动了交通运输业特别是航运业在上海的迅速发展,上海逐渐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的航运中心。

随着上海对外贸易的发展和国际贸易中心的形成和确立,大量的贸易商品在上海集散,上海传统运输业的沙船因无法和外国蒸汽轮船相抗衡而很难适应形势的需要。美好的航运业愿景像魔鬼般地吸引外国航运势力。上海开埠当年,就有17艘英美船驶入贸易,到1857年,达492艘。1850年以后,外国轮船公司先后开通上海至香港、加尔各答、欧洲的航线,以后又陆续开通上海至加利福尼亚、温哥华、横滨、神户、海参崴等地的航线,到1871年,上海已成为当时具有国际意义的航运中心。19世纪60年代上海至汉口的长江轮运航线开通,到90年代延伸到重庆,上海至沿海各重要港口的航线也开通起来,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和近海轮船运输网初步形成。上海远洋航运初为各大洋行控制,巨大的航运市场和丰厚的商业利润,刺激了各国对上海航运的竞争,专业轮船公司纷纷设立。1862年,美国旗昌洋行在上海设立轮船公司,专营上海至长江各口岸和中国沿海的客货运输,随后,英商公正、北清、太古、华海、怡和等轮船公司相继在上海设立,清政府设立的轮船招商局也投入国内外的运输。随后民族资本轮运企业兴起,新的内河航线不断被开辟,上海作为航运枢纽的地位更加突出。出入上海港口的船只与上海内外贸易的发展相适应,呈现出持续的增长态势。1920年进出上海港的船舶吨位超过2000万吨,从1923年起每年进出上海港的船舶吨位都在3000万吨以上。1928年,上海港已名列世界港口的第14位,1931年,上海港的吞吐能力超过鹿特丹、香港和蒙特利尔,跃居世界港口的第6位。上海港已成为世界级的贸易大港。^⑪

4. 对外贸易直接推动了上海现代工业的发展,上海成为全国的工业中心 上海开埠后,为对外贸易服务的工业如船舶修造、出口商品加工等首先在上海发展,到甲午战争后允许外资设厂,上海的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其实,上海的工业发展条件并非得天独厚,它的不足显而易见,尤其不具备原料优势。但是近代上海为什么会成为全国的工业中心呢?除了产业集聚、交通便利等因素外,对外贸易的直接和间接牵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首先,在外来廉价机制品的冲击下,上海周边农村及长三角地区自然经济首先走向瓦解,为上海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创造了廉价劳动力和商品市场。其次,上海最先受到外国商品优厚利润的刺激,不管是外资企业还是民族企业迅速在上海兴办和聚集。再次,上海工业的原料就内地来说是远了,增加了运输成本,但对于外国进口原料来说是近了,节约了运输成本,特别是外国机器等建厂设备对上海来说反而显得十分便利。还有,国内外贸易为上海工业发展提供了巨额资本、管理经验、商业网络,它所推动的上海城市发展也为上海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正如近代著名企业家刘鸿生在分析上海工业发展原因时,特别把“外来货料,既易进口,内轮行销,又极灵便”作为第一条。^③

在对外贸易的驱动下,近代上海聚集了各种有利工业发展的因素,产生了集合效应,上海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的工业中心。上海工业的门类、资本规模、生产规模、技术构成、经济效益等始终处于全国领先和主导地位。仅以1933年为例,在全国符合工厂法的2435家工厂中,上海有1229家,占全国总数的50.47%;资本总额占全国的40.96%。^④

上海工业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贸易量大大增加,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发生变化,原料、燃料、设备的进口大大增加了,棉布、面粉等轻工产品的出口大大增加。“1913年上海进口的棉纺织品占上海进口商品总值的43%,到1936年下降到2.2%”;机器、染料、电器材料、钢铁五金等生产资料进口大大增长,上海1931年的进口量是1913年的5.7倍,而且这些产品大部分从上海进口,要占全国的60%到70%。^⑤

以上仅仅从商业、金融、航运、工业等几个维度阐述对外贸易对上海城市经济的发展作用。对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上海城市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相辅相成地,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又有力地促进了国际贸易中心地位的形成和巩固,使上海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和国际化大都市。

四、上海重建国际贸易中心的历史启示

重建国际贸易中心,上海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和基础。总结近代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发展历程中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重建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地位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1. 要内外贸易共同发展,不能片面发展 国际贸易中心的核心是物流的汇聚,交易的集中,从而对全国乃至世界产生集聚力和辐射力。近代上海在开埠以后不长的时间内,迅速取代广州成为全国的国际贸易中心,并且长盛不衰,相当大程度上得益于内外贸易一体化的形成。内外贸易融合互动,中外经济密切联系,形成以上海为中心、以外贸为纽带、联通长三角、沿江、沿海腹地的商业网络,强力地驱动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地位的形成和稳固。正是内外贸易一体化的作用,全国商品汇聚上海,增强了出口贸易的后劲;外国商品在上海集散,推动了进口贸易在全国的辐射,从而构筑成大流通的市场格局。正如有学者指出:“由于外力的巨大作用,晚清上海很快把原来属于广州和苏州的对外对内商业贸易功

能都吸引到自己的身上来了。可以说上海地位的上升正是以广州、苏州这两个商业重镇地位的跌落为前提和代价的。”^⑧由此可见,没有内外贸易的空间整合和整体运作,要重建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地位是相当艰难的。现在有一种偏向,只顾外贸,忽视内贸,显然有失偏颇。

2.要有广阔的经济腹地,不能一枝独秀,要有与周边城市群共同发展的联动机制 如前所述,近代上海之所以能够取代广州成为全国国际贸易中心,上海具有比广州更加得天独厚的广阔经济腹地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正如一位国外著名的上海史专家所说:“上海的内地贸易区要算是世界上最大的了。如此宽广的地区,或者如此众多的人口,依靠一个主要河流系统和一个首要城市来开展商业往来,那是别的地方所没有的”。^⑨在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形成的过程中,河网交错、运输便利的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沿江城市以及南北沿海城市的同步发展对上海内外贸易一体化体制的形成和运作起到了巨大作用。当时,开埠后主要的出口商品生丝、茶叶等都由这些城市源源供给,进口的棉、纱机制品特别是以后的工业品和机器设备都由这些城市逐步消纳。所以,上海与周边、沿江、沿海城市的同步发展和紧密经济联系,是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应有之义。特别是现在的贸易环境、运输条件等与近代上海已有很大差别,我们在重建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地位时,要把上海放在区域一体化中来考虑和设计,否则,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集聚和辐射功能就无从发挥。

3.要有相关行业的均衡发展,不能单兵独进 从近代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地位形成的过程来看,它不是简单的进出口贸易量放大和攀升,而是相关行业的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结果。贸易中心不纯粹是买卖中心,而是商品流通的管理中心,这涉及诸多的配套服务,需要相关行业的同步发展。贸易是动力,进出口贸易的发达必然会带动国际航运业和金融业的发展。金融和航运是基础,没有国际航运业的发展和配套,国际贸易的规模就难以扩大;没有发达的国际金融业,国际贸易中心所需要的巨额资金和国际结算就无法实现,国际贸易中心地位也就无从谈起。没有以先进制造业为核心的现代工业的发展,上海对外贸易中心地位就缺乏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撑。因此,国际贸易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和工业中心是互为条件、互为支撑、互相促进的统一体,几个中心的建设必须协同共进,整体发展。现在有一种偏向,一是把几个中心孤立地看,一会儿说这个中心,一会儿说那个中心,没有把几个中心作为一个系统和整体来研究,从世界经济中心城市和近代上海发展来看,其实这几个中心在某种角度来看是一件事的几个方面,只不过是侧重不同而已。二是把经济中心与其他几个中心在一个层面上混为一谈。其实,经济中心和贸易中心、航运中心、金融中心不是同一层面的概念。经济中心与其他3个中心是涵盖的关系。贸易中心、航运中心、金融中心建成了,其他相关行业必然会有发展,经济中心也就自然水到渠成。

4.要有开放的促进贸易的社会和制度环境,不能只顾硬件忽视软件 国际贸易中心之所以会在某一地区形成,固然需要有诸如优越的区域位置或天然良港等自然禀赋要求,但仅此还远远不够。国际贸易中心之所以能吸引众多的贸易主体聚集,吸引众多的商品在此集散交易,最主要的还是它的交易成本及风险的最小化和利益的最大化,依靠集聚扩散优势,使全球商品流通集聚于此并扩散出去,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近代上海能在不长的时间内取代广州成为全国国际贸易中心,一个较为关键的因素就是它具有良好的社会和制度环境,降低了交易成本,保障了利益的最大化。西方列强在上海建立了实际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制度,近代上海的市场开放度在全国最高,市场准入门槛和程序却相对较低和简便,市场秩序良好,贸易要素流通顺畅,交易十分便利。正如著名经济史专家丁日初所说:“昔日上海外

贸总额之扶摇直上,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但归根到底是由于开辟商埠,实行贸易开放政策(不论被迫或自动)的结果。”^⑨同时,上海还汇聚了全国的外贸精英,上海对外语的重视和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和认同也是其他城市不能比拟的,开放过程中形成的海派文化塑造了开放的社会氛围,这都为上海的对外贸易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我们在建设国际贸易中心的过程中,一定要十分重视人才的作用,不能见物不见人;一定要重视文化和制度建设,创造有利于人财物聚集、有利于贸易发展的开放环境。

总之,我们还要借鉴中外历史上国际贸易中心形成的经验教训,充分把握国际贸易中心形成的3个重要特点:第一,国际贸易中心的形成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第二,国际贸易中心的形成是一个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复杂系统;第三,国际贸易中心的形成是一个内生建构而不是简单人造的产物。国际贸易中心的形成犹如一棵大树的长成,而不是房子的造就。房子可以造,树木只能育,它的形成自有内在的规律。我们所讲的国际贸易中心的建设或重建,只能在这个语义上来理解和把握。在重建国际贸易中心这件事上,我们只能充分认识和把握规律,优化其生长环境,顺应其成长特点,精心培育,促进其茁壮成长。否则,只能是拔苗助长,欲速则不达。

(作者单位: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注 释:

- ①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Z].北京:中华书局,1962:254~260.
- ② 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100.
- ③ 黄逸平.近代中国经济变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62.
- ④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33.
- ⑤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国际贸易学会学术委员会编.上海对外贸易(上册)[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28.
- ⑥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Z].北京:中华书局,1962:1095.
- ⑦ 聂宝璋.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144.
- ⑧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4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0~14.
- ⑨ R. Fortune, Three Years Wanderings in the Northern Provinces of China, Shanghai. 122(1935). 转引自苏全有,王奎.晚清经贸重心缘何由广州北移上海[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69~72.
- ⑩ 文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2008:2725.
- ⑪ 汤志钧,吴乾兑.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中下游的侵略罪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185~186.
- ⑫ 叶梦殊.阅世编[M].卷3.范廷杰.乾隆上海县志·序[A].转引自黄苇.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4.
- ⑬ 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512~513.
- ⑭ 丁日初主编.上海近代经济史(第1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71.
- ⑮ [美]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287~290.
- ⑯ 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编.吴兴农村经济[M].上海:上海图书馆藏,1939:122.
- ⑰ 参见王垂芳主编.洋商史:上海1843~1956[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65;[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399.;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学术委员会编.上海对外贸易(上册)[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67,199~200.
- ⑱ 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163.
- ⑲ 孙玉琴.简述近代上海对外贸易中心地位的形成[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4:81~85.
- ⑳ 班思德(T. Roger Banister).最近百年中国对外贸易史[M].海关总税务司署统计科译印,1931:38.转引自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117.

- ⑲ 班思德 (T. Roger Banister). 最近百年中国对外贸易史[M]. 海关总税务司署统计科译印, 1931: 39. 转引自张仲礼主编. 近代上海城市研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117~118.
- ⑳ [美]马士著. 张汇文等译.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405.
- ㉑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上海市纺织品公司棉布商业史料组. 上海棉布商业[Z].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1~15.
- ㉒ 张仲礼主编. 近代上海城市研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144~148.
- ㉓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 上海钱庄史料[Z].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0: 193~202.
- ㉔ 李必樟编译. 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 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Z].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3: 384.
- ㉕ 丁日初主编. 上海近代经济史(第1卷)[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447~449.
- ㉖ 唐传泗, 黄汉民. 试论1927年前的中国银行业[A].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第4辑)[C],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6: 82.
- ㉗ 洪霞管, 张继凤. 上海成为旧中国金融中心的若干原因[A].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第3辑)[C],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5: 33~35.
- ㉘ 叶晓山等. 中国战时经济特辑[M]. 上海: 中外出版社, 1939: 188.
- ㉙ 茅伯科主编. 上海港史: 古近代部分[M]. 北京: 人民交通出版社, 1990: 360~363.
- ㉚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 刘鸿生企业史料(下册)[Z].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3~4.
- ㉛ 张忠民主编. 近代上海城市发展与城市综合竞争力[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5: 366~368.
- ㉜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上海国际贸易学会学术委员会编. 上海对外贸易(上册)[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9: 193~194.
- ㉝ 乐正. 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 (1860~1910)[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27.
- ㉞ [美]罗兹·墨菲. 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M].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65.
- ㉟ 丁日初. 再论上海成为近代中国经济中心的条件[J]. 近代史研究, 1994, 1: 85~98.

The Formation of Shanghai International Trading Center in Modern Times and Its Enlightenment

XIA Si-yun

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Shanghai International Trading Center has witnessed three stages, respectively the germination,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unparalleled natural condition, long-lasting tradition in international trading, the agglomerative effect of related talents and trading entities, and the concerted operation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trade in Shanghai have all contributed to the pooling of resources of the two market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sound and healthy service system and of an enterprise-friendly social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trading boosted Shanghai's econom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itself, making it the national distribution center of goods, finance, seafaring and industry. The further prosperity of the center requires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s, a broad economic hinterland, a linkag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ighboring cities, a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related industries, and a more open trade-boosting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Key words: modern times; Shanghai; international trading center